

1950 年的地缘政治格局与中国援越抗法决策的制定

李桂华

(中国农业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新中国成立前夕, 基于对自身地缘政治格局的考虑, 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分工, 将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工作的指导权交付中国共产党之手。同时, 美国亦力图在拉拢中共的同时建立包围封锁新中国的环形防线, 以形成“防范共产主义扩张”的地缘政治“缓冲带”。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共产党根据其对中苏两党关系的定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格局的考虑以及对其在亚洲所面临的美国包围与封锁的考虑, 最终决定对亚洲国家的革命工作进行指导及援助。

关键词: 1950年; 中越关系; 援越抗法; 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14)05-0121-05

从1950年开始, 我们党和政府对越南共产党(时称印度支那共产党)进行援助, 支持越南的抗法斗争。这段历史被中国方面称为“援越抗法”。如今, 伴随着历史文件的解密、当事人的回忆和国内外专家的研究, 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已基本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 由于资料的局限和观点的迥异, 目前学界对1950年中国决定援越抗法时世界局势及中国最终决策援越抗法原因的分析仍显不足。因此, 笔者拟根据国内外公布的最新史料, 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 以及在此格局下中国援越抗法决策的地缘政治考量制定进行初步的分析。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使孤立无援地战斗在反法前线的胡志明和他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异常兴奋, 也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决定重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并请求来自新中国的援助。在当时的形势下, 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形势还非常严峻: 就国内而言, 经济上, 新中国的财政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国民党败退台湾, 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军事上, 全国

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大约100万军队, 占有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省的全部和陕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的一部。国际上, 中国虽然得到了苏联等国家的承认和支持, 但以美国为首的大部分国家却拒绝承认新中国。美国还采取政治上孤立, 经济上封锁、禁运, 军事上包围的方针, 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 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热情响应越南共产党的请求, 决定承认越南, 并尽一切可能地援助越南。那么, 为什么中共高层会作出这种决定呢? 本文试对此进行分析。

一、服从苏联的战略安排

1946年之后, 世界形势风云突变, 原有的美苏等国的大国合作局面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代之而起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极对抗。它们以西欧为主要战场, 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冷战的开始及持续进行, 改变了斯大林及苏联其他领导人对于大国合作的原有思维。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世界格局, 重新制

收稿日期: 2014-0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DJ006)

作者简介: 李桂华(1980-), 男, 山东垦利人, 中国农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讲师。

订苏联的对外政策。

对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而言,欧洲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首先,美苏冷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由于欧洲是“旧世界”的中心,又是通往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个关键性的边缘地带,还是抗衡苏联扩张的—个重要的缓冲区,所以在美国看来,欧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此,美国相继在欧洲实施了一系列动作。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政治上的“杜鲁门主义”,军事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针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西欧的挑战,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针锋相对,在经济上实施莫洛托夫计划,以阻止美国资本对东欧各国的侵蚀、渗透。在政治及军事上,组建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以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两个阵营的冷战已经以欧洲为中心,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其次,苏联是传统的欧洲国家,欧洲部分对于苏联而言具有极高的地缘战略作用。就苏联本身而言,苏联的煤、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大部分都储藏于苏联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部分;苏联的欧洲部分也是苏联重要的产粮区,苏联的小麦等农作物多集中在这一区域;就城市发展而言,当时苏联的人口多集中于东欧平原地带。以1939年的统计数据为例,苏联当时共有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11座,其中有10座坐落于东欧平原及乌拉尔山以西地区,占总数的90.9%。在十万人以上的71座中型城市中,欧洲部分占据了74.6%。在五万人以上的92座小型城市中,欧洲部分占据了78.3%。如果以此推算,则苏联将近80%的人口都集中于欧洲部分^[1]。而且,苏联的首都莫斯科,重要城市基辅、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均坐落于此,可以说,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欧洲部分。该地区是苏联地缘政治区域的核心区,也是其最重要的潜在实力地带。再次,苏联的地缘政治的弱点在于欧洲部分。苏联地缘政治的核心区域坐落于东欧平原之上。整个区域东起乌拉尔山脉,西达波罗的海,面积约为400万平方千米,平均海拔仅170米。这一地形使整个苏联的欧洲部分异常开阔、—马平川。该区域的平原地形及优良的气候条件使其无可争辩地成为苏联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核心区,但该地区的地形也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苏联地缘政治中最大的弱点或致命点。因为—地区没有任何自然障碍可资凭借,易攻难守,极难守卫。此外,就西欧的地缘政治作用而言,西欧一直是传统的

世界力量中心之一,又是美国—直力图控制的重要地缘政治区域。如果美国或是复兴后的欧洲某国在西欧地区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它们将可以利用欧洲的战略优势和通往苏联中心腹地的便利条件,从西向东对苏联的存在及发展形成致命性威胁。

相对于欧洲对于苏联的重要作用,亚洲对于苏联则明显缺乏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首先,两极格局对抗主要以欧洲为战场,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基本没有涉及。其次,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欧洲部分,亚洲广大区域对于苏联而言并不具备极强的地缘政治影响。再次,苏联在亚洲区域的地缘政治优势明显,其在亚洲缺少力量较为强大并能对苏联利益形成威胁的国家。同时,苏联在亚洲区域的边界大都有明确的自然疆界可作依据。南面以喀尔巴阡山、高加索山及帕米尔高原为界,东部及东南部则以人烟稀少的沙漠及半沙漠地带和新疆、蒙古等地分界^[2]。这些高山、荒漠构成了苏联在远东地缘政治区域的有效“缓冲区”。

鉴于欧洲区域的重要性及冷战的紧迫性,苏联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此,而无暇顾及亚洲地区的事务。但是,这不等于说苏联不重视亚洲事务。其实,早在1947年,苏共中央即修改了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地的观点,并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向亚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传达^[3]。但由于苏联工作的侧重点远在欧洲,对亚洲事务明显缺乏兴趣与能力。而且,由于苏联的文化及历史发展与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差甚远,缺乏指导亚洲革命发展的条件。因此,很长时间内,苏联在亚洲的努力并不成功,亚洲的革命长期处于低潮。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远东地区两极的力量对比,使中国成为远东地区的潜在力量中心,也使苏联找到了—个可以在亚洲帮助苏联的朋友。因此,苏联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在亚洲事务中挑起大梁,并成为苏联整个共产主义事务中的有力帮手。基于上述考虑,苏联没有同意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初所提出的加入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请求,而是提议由中共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亚洲共产党中央局^[4],指导和帮助包括越南在内的广大亚洲国家寻求解放。1949年6月,斯大林对刘少奇提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中苏两家来个分工,中国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5]。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共产党一直在指导着中国的革命运动。因此,在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苏联共产党在国际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苏联共产党的意见也是应该积极支持的。正如刘少奇于1949年7月4日在《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所说:“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二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6]对于中共的说法,斯大林没有同意,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7]即便如此,中共中央仍然坚持了自己的两党关系定位,即“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8]基于这种两党关系的定位,当苏联共产党及斯大林本人向中共提出两党分工合作,共同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建议后,中共基本上已经无法拒绝,而只能接受苏联共产党及斯大林的这一提议。

二、基于国际共产主义原则的考虑

除上述原因外,中共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及民族主义两项原则关系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共能否接受苏共的批示及斯大林的建议。

在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后,各国的共产党人建立了一种以国际主义为首要原则的共产主义的关系范式。在这种关系范式中,以意识形态同质性下的国际主义原则为党际与国际关系首要原则。即一党及一国对具有意识形态同质性的另外的党和国家具有进行支援与帮助的责任和义务。在这种关系范式中,已经取得胜利的党(A)有责任有义务帮助还没有取得胜利的党(B)。A必须不计成本、不顾代价地支援B,帮助B早日取得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时,由于A的援助是基于国际主义原则的考虑,其行为具有道德上的至上性。因此,B必须毫无保留地与A

协调一致,服从A的指导,听从A的指挥。亦即A获得了对B党及国家事务的绝对权威。但是,如果A没有尽自己所能对B进行帮助,或是在某些事务上背离了其所坚持的国际主义原则,那么,A将失去其所具有的对B的道德上的领导权,成为集团中为人所不耻的“叛徒”,从而受到所有成员的批判。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积极地将该范式贯彻到自身革命运动中去。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说的:“二十四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就援助了外国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9]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与越南共产党及越南政府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复制了这种共产主义的关系范式,将之运用于中越关系的交往中。对于这种关系范式,正如刘少奇所说,无产阶级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应“从本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同时也是从“全人类共同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任何的民族压迫”^[10]。基于这一原则,“在被压迫民族中,共产党人如果不去具体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为民族解放而斗争,而只把‘国际主义’当成装饰的空谈,那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帮助了帝国主义”^[11]。同时,“共产党人如果在自己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之后”,“又去实行民族利己主义,又去为了一个民族上层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全世界各民族劳动人民与无产阶级群众共同的国际利益……那也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援助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并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阵营内的小卒”^[12]。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共产党人在自己国内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取得政权以后,就必须马上取消本国帝国主义对于国内及国外一切民族的压迫”^[13]。

基于对中苏关系的定位及对国际主义原则的认识,中共领导人逐渐形成了关于整个世界新的革命图景:整个世界按照革命与否及革命的程度被分成三个部分,即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处在革命之中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使这些国家都能够实现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目标,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各负其责,分别负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东方及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共产党的任务是,以西欧为战场,抵御美国等帝国主义的进攻,并指导发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击败它们。中国

共产党的任务是,以亚洲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战场,援助、指导被压迫国家的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体系,切断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并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因此,对于苏联共产党的战略安排,中共中央表示同意,并于此后逐步将支持和援助亚洲各国人民和共产党开展民族解放斗争,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主要任务。

三、基于远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判断

对美国而言,东南亚地区是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正如对当时美国政策制定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所说,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单纯的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对抗”。“对我们安全的威胁,每次都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眼看要被一个单独的强国所统治。”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于,防止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被一个大国单独统治,并“防止旧世界几个实力中心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利益”^[4]。

在美国看来,如果中共取得政权,中国及整个远东地区将形成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图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使共产主义在远东地区得到巨大的扩张,苏联也将得到向整个东南亚地区扩张的有利条件。为防止中共成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代理人和入侵东南亚的急先锋,美国亟须确切地了解中共外交政策的真正意图。因此,美国开始频繁试探中共的真实态度,并伺机分化瓦解中苏之间的亲密关系。

1949年4月,当人民解放军解放南方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坚持不随国民党南撤,并向中共方面提出了美国愿意与中共建交的信息。是年8月,美国国务院更是抛出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对中美两国的历代“友好”进行了回顾,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向参议院提交的一份关于远东局势的全面报告中仍然提出,“未来美国对华政策依然是不承认也不反对”^[5]。此后,在听闻毛泽东赴苏联访问的消息后,杜鲁门甚至在演说中公开声称:“美国对台湾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6]

为防止拉拢不成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也是出于防范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入侵”的考虑,美国对中

国及东南亚采取了另外一套政策,即积极联合亚洲自由国家,共同防范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1949年3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即向杜鲁门政府建议,促使法国、荷兰等国调整其在东南亚的殖民政策,以配合美国建立“亚洲人的反共屏障”,并确保以亚洲的民族主义战胜“红色的帝国主义”。而且美国此时已经开始设计其在东南亚的政策,以此来防范共产主义的扩张^[7]。是年4月2日,英国外相贝文照会艾奇逊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防范苏联及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的方法,即“建立一条从阿富汗到印度支那的共同战线,就有可能遏制俄国的南进……一个稳定的东南亚也将最终影响中国的局势,并有可能扭转在那里的局面”^[8]。这一想法与美国政府的考虑不谋而合,在此之后,美国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布置这条防线,以防止共产主义对东南亚的进攻。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中国的危机——对于美国政策的审查》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艾奇逊正式对外公开了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即建立“一条经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然后到琉球群岛,南至菲律宾群岛的环形防线,用以抑制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9]。

相比美方而言,中共头脑中的远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图景形成时间较早。在这一图景中,中国无论是从地缘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都无可争辩地应该与苏联为友,倚靠苏联,将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而美国——资本主义世界新的领导者——长期支持国民党及其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为敌,与国际主义的老大哥——苏联为敌,其目的不外乎是想扑灭世界共产主义的火焰,并霸占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因此,无论从何种理由出发,中共都不可能与美国成为朋友。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从中共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情报显示,美国已经制定了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计划对中国及苏联进行核打击和占领^[10]。

基于上述考虑,中共并没有对美国的一系列拉拢动作给予过多的好感。早在瓦尔德事件发生后,中共就已经制定了“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的方针”^[11]。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新中国“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的“一边倒”方针。是年8月,美国《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后,毛泽东更是亲力亲为,

连续发表了5篇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审视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分析了所处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环境及其与中共关系的定位后,就已经决定服从苏联共产党的战略安排,主动承担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中共此举,其地缘政治意图大致有二:一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苏联共同承担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工作。通过指导和援助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活动促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胜利。二是打破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环形封锁,形成中国地缘政治的缓冲区和突破口。

在上述决定作出后,中共开始积极筹划对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指导与援助。1949年2月,中共中央即开始着手邀请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派干部来中国学习,研究各国民族解放问题。1949年11月,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并号召各国学习中国革命经验的公式,走类似的道路^[22]。在中共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并开始付诸实施期间,越南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也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与中共联络,寻求与中共建立联系,并向中共请求援助。对于越南共产党的请求,中共高层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在得到越南希望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后,当时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决定在法国尚未承认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随即,在得知越南已经宣布承认中国后,毛泽东在莫斯科发来急电:“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23]195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即派出罗贵波赴越,以了解越南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的实际情况,并为之后的援越工作作准备。1950年1月27日,毛泽东更是在给刘少奇的回电中称:“对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24]在此之后,中共即开始了对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帮助与支援,中国的援越抗法工作正式展开。

参考文献:

- [1][2]葛里哥利.苏联地理[M].上海:开明书店,1951:216;119-120.
- [3]约翰·F·卡迪.战后东南亚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64-66.
- [4]3February1949,APRF:F.39,Op.1,D.39,LL.47-53.Published in Bulletin#16byCWHP.
- [5]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09.
- [6][7][8][24]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6-17;34;21-22;425.
- [9]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93.
- [10][11][12]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一)[N].人民日报,1948-11-07.
- [13]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二)[N].人民日报,1948-11-07.
- [14]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84-85.
- [15]Senate Unit Hears Acheson on China, New York Times, Oct 13, 1949: 19
- [16]Harry S. Truman,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January 5, 1950, Harry S. Truman Library and Museum.
- [17][18]FRUS, 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 O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Volume VII, Part 2, pp. 1128-1133; 1137.
- [19]Acheson's Riposte, The Washington Post, Jan 13, 1950, p.18
- [20]H B 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2,(9):29-31.
- [21]杨奎松.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事件始末——中共与美国的最初对抗[EB/OL].(2009-12-31)[2013-10-22].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210/14/366037_185541721.shtml.
- [22]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N].人民日报,1949-11-22.
-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238.

责任编辑:黎伟盛